

中国工业贸易调整成本的经验研究

——边际产业内贸易视角的分析

马 鹏¹ 秦晓敏²

(1. 广东金融学院 会计系, 广东 广州 510251; 2. 暨南大学 产业经济研究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 本文根据“平滑调整假说”, 从产业内贸易角度构造了相对要素调整指数来区分同一产业在不同的生产要素上的调整压力的差异, 并用 A 指数、S 指数和 S' 指数测算了我国工业 20 个行业的贸易调整成本。研究表明: 我国技术水平较高的行业贸易调整成本较低, 而技术水平较低的行业贸易调整成本较高, 进口扩张型行业的平均产业内贸易水平高于出口扩张型行业, 且同一行业在不同生产要素上的调整压力不同。因此, 应支持和鼓励中、高技术行业的发展, 积极推进低技术行业的合理转型和优化升级, 并重视贸易对不同生产要素的调整成本以降低结构性失业风险。

关键词: 工业贸易; 调整成本; 产业内贸易; 平滑调整假说; 产业政策; 贸易自由化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230(2013)03-0059-08

一、引言

入世以来, 随着贸易壁垒的不断降低, 我国的进出口总额迅速增加。贸易的发展使我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 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更加深化, 进而推动了对外贸易特别是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按照国际贸易理论, 对外贸易有利于贸易国收益增加和福利提高。但这一目的的实现必须满足一定前提条件, 如各种资源和要素能够在不同的产业或者某一产业的不同行业间迅速、无成本的流动、贸易带来的福利能够在不同群体中进行平等分配。很显然, 这些前提条件一般很难满足。不同产业的技术类别和技术水平各不相同, 对应的要素密集度也存在差别。因此, 在短期内, 贸易发展引起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会对不同的经济体产生不同的影响, 从而引发一定的调整成本。这也是在贸易自由化的大趋势下, 各国仍然竭力寻求贸易保护的主要原因。基于此, 本文将重点分析贸易引发的我国工业内部各行业的调整成本, 从而为完善我国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提供借鉴。

收稿日期: 2013-02-1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经济控制力的高端服务业集聚研究”(71003028);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加快发展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研究”(11JZD023); 中国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项目“基于高端服务业发展的中国产业安全强化研究: 产业控制力视角的分析”(2012T50174)

作者简介: 马 鹏(1978—), 男, 河南浙川人, 广东金融学院会计系副研究员;

秦晓敏(1983—), 女, 山东潍坊人, 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生。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目前,学者普遍采用基于边际产业内贸易的方法,衡量市场开放对生产要素的冲击和相应的调整成本。这一方法来源于 Balassa 首次提出的“平滑调整假说(the smooth adjustment hypothesis, SAH)”。他认为,由于同一产业内部具有相似的生产技术和资源需求,与产业间的调整相比,资源和要素在同一产业内部的流动更加畅通^[1]。于是,资源调整的时间相对较短,生产要素在新的部门和岗位的适应性相对更强,调整的阻力较小,由此引发的贸易摩擦较少,最终产生的调整成本也就较低。因此,可以用产业内贸易水平的高低来衡量贸易自由化引起的调整成本的大小。一般来说,对外贸易引起的产业结构调整关系到多种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但学者们通常最关注的是劳动力的流动。从劳动力流动成本角度看,“平滑调整假说”的成立依赖于以下假设:产业内劳动力的流动性要比产业间的劳动力流动性更强。由于同一产业内的产品性质的相似性,其所需要的劳动技能也具有共通性,劳动者不需要经过太多的技能培训就可以向扩张的产品部门流动,相应地,劳动力流动的时间成本和物质成本都较低。因此,产业内贸易的调整成本相对较低。经验研究的结果也倾向于证实“平滑调整假说”的正确性。Brulhart 和 Elliott 用工人的失业率和工资的变化情况作为衡量调整成本的变量,发现欧盟建立以后各国工业的调整压力并没有想像的那样大,原因在于欧盟的建立促进了各国之间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减少了生产要素调整的摩擦成本^[2];Marius Brulhart 等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 1979~1990 年爱尔兰 64 个行业进行了研究^[3];Robert J. R. Elliott 等对英国制造业进行了研究,结果支持都 SAH 的正确性^[4];Horacio Faustino 和 Nuno Leitao 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葡萄牙制造业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SAH 是否有效取决于劳动力调整成本指数、滞后结构和相关控制变量的选取^[5]。

国内的相关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平滑调整假说”在我国的适用性进行检验,另一类是应用“平滑调整假说”对贸易自由化给我国带来的调整成本进行评估。李坤望、王诏怡通过对制造业三分位职工变动数和 S 指数的秩相关检验,证明了 SAH 假说在我国的适用性,尤其是在低技术和劳动力密集型部门更是如此^{[6][7]};孙孟选取 2000~2007 年我国制造业 27 个细分行业作为研究对象,对 SAH 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提高降低了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调整成本^[8];在“平滑调整假说”的应用方面,李坤望、施炳展通过核密度估计、KS 检验和 Daniels 趋势检验评估了我国 1987~2004 年制造业贸易自由化的调整成本,认为我国制造业贸易自由化的调整成本整体偏高,但由于中技术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的增加趋势,制造业的调整成本又呈现出减少的趋势;贸易调整成本的行业结构上,佟家栋、刘钧霆运用 1992~2003 年间我国与日韩制造业的贸易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的行业的贸易调整成本较大,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行业调整成本较小^[9];然而,孙孟、张彬对 1992~2008 年间中澳工业制成品贸易调整成本的研究以及莫莎、刘朝霞对 1992~2008 年间中美工业制成品贸易调整成本的研究都表明,中高技术密集型制造品行业调整成本低于初级产品以及劳动力和资源密集型制造品行业^{[10][11]};陈立泰等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12]。

综合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往的学者在研究调整成本的时候都把同一产品或者产业作为一个整体,而不区分生产要素的差异。事实上,每一种产品都是多种生产要素的集结、加工和增值,且不同的生产要素在同一种产品生产中的使用密度和地位不同。正是由于要素密集度的不同,同一产品或者产业在不同的生产要素上的调整压力是不同的,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调整压力要大于非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基于此,本文将尝试构造相对要素调整指数(S'指数)来区分同一产业在不同的生产要素上的调整压力的差异,以更加准确、全面地衡量贸易调整成本的大小,为我国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借鉴。

三、测算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 测算方法的说明

关于边际产业内贸易的指标,比较流行的测算方法有 A 指数、B 指数和 S 指数。由于 S 指数的构造原理和测度效果与 B 指数类似,但是比 B 指数更为准确,所以,本文拟选用 A 指数和 S 指数来衡量贸易的调整成本。另外,本文将构造相对要素调整指数(S' 指数),以反映同一行业在不同生产要素上的调整成本和调整压力的差异。具体来说:

$$A_i = 1 - |\Delta X_i - \Delta M_i| / (|\Delta X_i| + |\Delta M_i|)$$

其中, ΔX_i 和 ΔM_i 分别表示一种产品或者一个产业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出口和进口的变化量。A 指数的取值范围是 $0 \leq A \leq 1$,A 指数越接近 0,表明增加的贸易额中产业间贸易的比重越大,贸易的调整成本越大;A 指数越接近 1,表明增加的贸易额中产业内贸易的比重越大,贸易的调整成本越小。以每种产品的进出口差分总额所占的比例为权重,就可以衡量整个行业的贸易调整成本。A 指数是最常用的衡量边际产业内贸易的指标,其优点在于直观、便于不同行业或者产品之间的比较。但是,A 指数的值均大于零,无法反映贸易的方向。其隐含的假设是,贸易扩张带来的调整成本(由净出口增加产生)和贸易收缩带来的调整成本(由净进口增加产生)是相同的。在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失业的情况下,这种对称性假设显然是不合理的,故我们引用 S 指数:

$$S_i = (\Delta X_i - \Delta M_i) / 2(\text{Max}\{|\Delta X_i|, |\Delta M_i|\})$$

S 的取值范围是 $-1 \leq S \leq 1$,其中, $|S|$ 越接近 0,表明增加的贸易额中产业内贸易的比重越大; $|S|$ 越接近 1,表明增加的贸易额中产业间贸易的比重越大。 $S > 0$,表明贸易处于扩张性调整,该产品具有相对良好的贸易绩效; $S < 0$,表明贸易处于收缩性调整,该产品的贸易绩效相对不良。具体来说,当 $-1 \leq S < -0.5$ 时,该产品处于进口扩张型产业间贸易状态,并且,S 越接近 -1 贸易绩效越差,调整成本越高;当 $-0.5 \leq S < 0$ 时,该产品处于进口扩张型产业内贸易状态;当 $0 \leq S < 0.5$,该产品处于出口扩张型产业内贸易状态,并且,S 越接近 0,贸易绩效越好,调整成本越低;当 $0.5 \leq S < 1$ 时,该行业处于出口扩张型产业间贸易状态。因此,通过 S 指数可以判断贸易的状态和调整的方向,从而更加准确的衡量贸易的调整成本。当衡量整个行业的贸易调整成本时,以 $w_i = \text{Max}\{|\Delta X_i|, |\Delta M_i|\} / \sum_{i=1}^n \text{Max}\{|\Delta X_i|, |\Delta M_i|\}$ 为权重加权平均,即 $S = \sum w_i s_i$,行业贸易变化的判定方法与产品相同。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S 指数测度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要高于 A 指数。这是因为,与 A 指数构造原则相一致并且能够反映贸易增量变化方向的是 B 指数($B = (\Delta X_i - \Delta M_i) / (|\Delta X_i| + |\Delta M_i|)$),但是 B 指数的缺陷在于当 ΔX_i 和 ΔM_i 异号时,其值就会变成 1 或者 -1。S 指数($S_i = (\Delta X_i - \Delta M_i) / 2(\text{Max}\{|\Delta X_i|, |\Delta M_i|\})$)遵循了 B 指数的构造原则,并且避免了 B 指数的缺陷。但是,由于 S 指数的分母变大,由其测量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也会相应提高。

归根结底,调整成本是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所产生的成本。同一种产品或者产业对不同的生产要素的使用密集度不同,其所产生的要素调整成本也不同。A 指数和 S 指数都无法反映这种生产要素层面上的调整成本的差异,因此,本文构造相对要素调整指数 $S'(i,j) = S_i \times \eta_i^j$,其中, S_i 代表第 i 产品或者产业的 S 指数, η_i^j 代表第 i 种产品或者产业在第 j 种生产要素上的相对密集度, $\eta_i^j = \Gamma_i^j / \text{Max}\{\Gamma_1^j, \Gamma_2^j, \dots, \Gamma_i^j\}$, Γ_i^j 为单位价值产品要素含量, η_i^j 的取值范围是(0,1)。i 产品或者产业使用 j 生产要素的密集度越高, $S'(i,j)$ 指数就越大,贸易引起的此种生产要素的重置成本也就越大。显然, S' 指数和 S 指数的符号相同,即二者衡量的产业内贸易的方向相同。

(二) 数据说明

从前面的理论分析可知,贸易调整成本行业结构的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来源于两个原因:第一,数据年份的选择差异。2001 年 12 月 11 日以后我国正式加入 WTO,开放程度进一步加深,我国加大了在产业和产品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的力度。加工贸易的发展提高了我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而加

工贸易主要发生在产品价值链较长的高新技术行业。因此,2002年以后的数据将倾向于提高高技术行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降低其贸易调整成本。第二,国别差异。贸易对象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特点决定其与我国的贸易结构,从而影响分行业衡量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和贸易调整成本。鉴于以上两个原因,本文选择2002~2010年间我国同世界的进出口贸易数据进行分析,并忽略掉国别因素,从整体上研究入世对我国工业调整成本的影响。由于调整是一个生产要素的供给缺乏弹性的中短期问题,本文中的差分数据选择滞后一年期。所有的原始贸易数据均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计算采用SITC Rev. 3四分位数据,选取约720种商品(不同的年份有所不同)。根据盛斌SITC Rev. 3和中国工业行业分类的转换标准^[13](P517-529),将这720种商品集结到20个代表性行业中。本文使用的资本和劳动力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四、边际产业内贸易与调整成本分析

(一) A 指数分析

由图1可以看出,中国加入WTO以后工业整体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并没有明显上升,A指数呈现出在波折中下降的趋势,在2009~2010年又有所回升。这说明我国工业行业的贸易主要还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贸易的调整成本较大。产业内贸易(特别是水平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提高依赖技术水平的提高、品牌的建立以及规模经济的形成等,而这些因素的积累和条件的完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我国加入WTO到现在仅有10多年,经济结构仍然处于调整期,贸易自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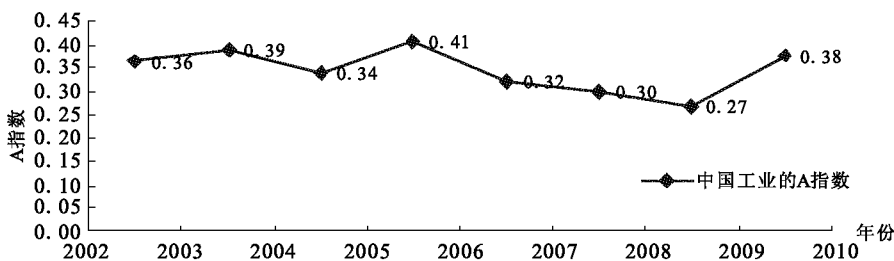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工业的A指数

数据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将选取的20个工业行业分为高技术行业(H)、中技术行业(M)和低技术行业(L),然后对2002~2010年各行业的A指数均值进行排序(见表1),并且按照A指数均值的中值将这20个行业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高于中值,一部分等于或者低于中值。由表1可见,在高于中值的10个行业中有5个高技术行业和5个中技术行业,在等于或者低于中值的10个行业中,有7个低技术行业、2个中技术行业和1个高技术行业,并且,这两个中技术行业和一个高技术行业的A指数都比较接近中值,A指数水平较低的主要是低技术行业。为了进一步说明不同技术水平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差异,我们将高技术行业、中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进行汇总,分别计算其A指数。结果发现,2002~2010年间,高技术行业的A指数为0.42,中技术行业的A指数为0.31,低技术行业的A指数只有0.16。

A指数的计算结果表明,产业内贸易更容易在技术水平较高的行业内发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技术水平较高的行业中产品的价值链较长,更易于在全球生产一体化中进行国际分工。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的分类标准,同一产品价值链上的进出口不管工序的复杂程度都属于同一商品类别之列。所以,即使我国高技术行业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加工贸易的发展也会带动我国高技术行业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技术水平较高的行业内产品更容易差异化,而产品的差异化也是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原因之一。低技术水平的行业主要是资源和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国际贸易遵循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原则,主要是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的水平很低,贸易调整成本较大。

(二)S 指数分析

由表 2 可以看出,在 2002~2010 年间,20 个代表性行业的 S 指数均值都在 $-0.5 \sim 0.5$ 之间,这显示了我国工业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贸易格局。另外,正如前所述,S 指数测度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会高于 A 指数。

根据表 2 中的计算结果,S < 0 的行业有 9 个,其中包括 3 个高技术行业、2 个中技术行业和 4 个低技术行业;S > 0 的行业有 11 个,其中包括 3 个高技术行业、5 个中技术行业和 3 个低技术行业。出口扩张型和进口扩张型行业的数量相当,并且两种不同的产业内贸易形态的行业结构类似,说明我国工业进出口的行业结构相对平衡。进口扩张型行业的 S 均值为 -0.10 ,其绝对水平小于出口扩张型行业的 S 均值

表 1 2002~2010 年中国工业各行业按 A 指数均值的排序

行业名称	A 指数均值	A 指数排序	行业类别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0.58	1	H
塑料制品业	0.47	2	H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0.44	3	H
通用设备制造业	0.42	4	M
医药制造业	0.42	5	H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34	6	M
专用设备制造业	0.33	7	H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0.32	8	M
金属制品业	0.31	9	M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	0.31	10	M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30	11	L
橡胶制品业	0.26	12	M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0.25	13	H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22	14	M
饮料制造业	0.20	15	L
纺织业和化学纤维制造业	0.19	16	L
非金属矿采选业	0.13	17	L
食品加工和制造业	0.13	18	L
造纸及纸制品业	0.11	19	L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0.09	20	L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四分位数据计算得到。

表 2

2002~2010 年中国工业各行业的 S 指数

行业名称	S 指数均值	S > 0 的年份数	S < 0 的年份数	行业类别
非金属矿采选业	-0.23	1	7	L
饮料制造业	-0.15	1	7	L
造纸及纸制品业	-0.14	2	6	L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10	3	5	L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0.10	1	7	M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	-0.07	3	5	M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0.05	2	6	H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0.04	3	5	H
专用设备制造业	-0.03	2	6	H
均值	-0.10			
食品加工和制造业	0.04	5	3	L
医药制造业	0.09	7	1	H
通用设备制造业	0.10	6	2	M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18	6	2	M
橡胶制品业	0.20	7	1	M
塑料制品业	0.22	8	0	H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30	8	0	M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0.35	7	1	L
金属制品业	0.37	8	0	M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0.38	8	0	H
纺织业和化学纤维制造业	0.40	8	0	L
均值	0.24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四分位数据计算得到。

0.24,说明进口扩张型行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更高。相对于出口扩张型行业对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吸纳作用,进口扩张型行业的收缩性调整中释放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重置成本将更高,因此,其较高的产业内水平有利于降低调整压力。

从表2的计算结果还可以看出,技术水平较高的行业其产业内贸易水平也较高,这与A指数的结论一致。特别是在 $S < 0$ 的进口扩张型行业中此结论更加明显,高技术行业中的专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排在前三位,分别为 -0.03 、 -0.04 和 -0.05 ,远远高于低技术行业中的造纸及纸制品业($S = -0.14$)、饮料制造业($S = -0.15$)以及非金属矿采选业($S = -0.23$),而中技术行业中的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则排在二者之间。S指数越接近0,其所代表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就越高,当 $S = 0$ 时为完全产业内贸易。我们用 θ_i 代表贸易活动对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偏离,则 $\theta_i = |S_i|$, θ_i 越小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因此,我们可以用 $\theta = (\sum_{i=1}^n \theta_i) / n$ 来代表同一技术水平的多个行业对产业内贸易平均的偏离度,n是同一技术水平下的行业的数量。经计算,高技术行业平均偏离度 $\theta_H = 0.134$,中技术行业平均偏离度 $\theta_M = 0.190$,低技术行业平均偏离度 $\theta_L = 0.203$ 。由此可见,行业的技术水平越高,其对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偏离度就越小,这与上面的分析相一致。

(三)S'指数分析

如前所述,S'指数的计算结合了生产要素的使用情况。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取资本(K)和劳动力(L)这两种主要的生产要素进行比较。

与S指数的分析一样,我们把调整成本分为扩张性和收缩性两种。由表3可见,加入不同生产要素使用密度以后的调整成本排序有所改变,说明同一行业在不同的生产要素上的调整成本是不同的。因此,结合我国的要素禀赋和要素市场现状,S'指数更能准确的衡量各个行业的调整压力。出口扩张

表3 2002~2010年中国工业各行业S指数和S'指数的比较

行业名称	S均值	S _L '均值	S _K '均值	行业类别	按S均值排序	按S _L '均值排序	按S _K '均值排序
非金属矿采选业	-0.23	-0.16	-0.13	L	9	9	9
饮料制造业	-0.15	-0.06	-0.09	L	8	6	6
造纸及纸制品业	-0.14	-0.06	-0.11	L	7	7	8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10	-0.10	-0.10	L	6	8	7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0.10	-0.03	-0.06	M	5	5	5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	-0.07	-0.02	-0.03	M	4	2	4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0.05	-0.02	-0.01	H	3	3	3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0.04	-0.02	-0.01	H	2	4	2
专用设备制造业	-0.03	-0.01	-0.01	H	1	1	1
食品加工和制造业	0.04	0.01	0.01	L	1	1	1
医药制造业	0.09	0.04	0.05	H	2	2	3
通用设备制造业	0.10	0.05	0.04	M	3	3	2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18	0.06	0.07	M	4	4	4
橡胶制品业	0.20	0.11	0.11	M	5	5	7
塑料制品业	0.22	0.12	0.10	H	6	7	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30	0.18	0.21	M	7	8	11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0.35	0.22	0.15	L	8	10	9
金属制品业	0.37	0.18	0.12	M	9	9	8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0.38	0.11	0.11	H	10	6	6
纺织业和化学纤维制造业	0.40	0.25	0.20	L	11	11	10

数据来源:贸易数据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四分位数据计算得到,资本和劳动力数据来自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型行业中从资本要素相对调整成本的角度看调整压力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第一)、纺织业和化学纤维制造业(第二)以及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第三)。从劳动力要素相对调整成本的角度看,调整压力排在前三位的是纺织业和化学纤维制造业(第一)、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第二)和金属制品业(第三);进口扩张型行业中从资本要素相对调整成本的角度看调整压力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非金属矿采选业(第一)、造纸及纸制品业(第二)以及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第三),从劳动力要素相对调整成本的角度看,调整压力排在前三位的是非金属矿采选业(第一)、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第二)以及造纸及纸制品业(第三),进口扩张型行业的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和出口扩张型行业的食品加工和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中资本和劳动力的调整压力与行业总体调整压力相同,说明这些行业的资本和劳动力的使用密集度还不足以使本行业的调整成本发生重大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与行业整体调整成本相比,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相对要素调整成本(无论是资本要素相对调整成本还是劳动力要素相对调整成本)下降幅度较大,从第10位下降到第6位。这是因为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技术水平较高,单位产品凝聚的资本和劳动力价值相对较少。换句话说,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其最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是科学技术。而本文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只考虑了资本和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一个局限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中 SITC Rev. 3 四分位数据,从边际产业内贸易的角度研究了我国加入 WTO 以后(2002~2010年)工业行业的贸易调整成本问题。A 指数和 S 指数的研究结果都表明,我国技术水平较高的行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贸易的调整成本较低。相反,技术水平较低的资源 and 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贸易的调整成本较大。研究结果的一致性也表明了本文指标选取的合理性。同时,S 指标的研究结果还表明,我国进口扩张型行业的产业内贸易平均水平要高于出口扩张型行业,这将有利于减轻我国贸易收缩性调整压力。最后,本文用相对要素调整指数 S' 分别测算了各行业资本和劳动力的调整成本,证实了同一行业在不同生产要素上的调整成本的差异。据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支持和鼓励中、高技术行业的发展。一方面,我国应继续加大科技投入,鼓励科技创新,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另一方面,扩大中、高技术行业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加强国际交流,引进和吸收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经验,进一步提高产业内贸易水平。A 指数的研究表明,虽然我国高技术行业的调整成本相对较低,但是产业内贸易的绝对水平也只有 0.42,这表明产业间贸易仍然是主要的贸易形式。要降低整个工业行业的贸易调整成本,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其次,积极推进低技术行业的合理转型和优化升级,大胆淘汰夕阳产业和落后产能。近年来,我国国际贸易一直呈现非均衡增长^[14]。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总部和海外工厂之间实行纵向分工,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分配,其设在母国的总部和工厂从事产业链中增值较高的知识密集型环节,而设在海外的子公司则主要从事产业链中增值相对较低的劳动密集和资本密集型环节,这种纵向分工就可能导致高收入国家进口中低档产品和低收入国家进口高档产品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发生。对此,我国不仅要积极推进低技术行业的合理转型和优化升级,更应大胆淘汰夕阳产业和落后产能,有步骤地逐渐实现产业内贸易从垂直型向水平型演进,争取实现与发达国家的进出口产品在技术含量、增值效应等方面相近。研究也表明,低技术行业主要是资源和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贸易调整成本较大。因此,我们要转变经济发展的理念,大胆弱化对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成本的依赖,积极引进和自主研发新技术和新设备来提升传统产业或催生新的业态,降低贸易调整成本。

最后,重视贸易对不同生产要素的调整成本,降低结构性失业风险。研究表明,收缩性劳动力要

素相对调整压力最大的三个行业是非金属矿采选业、煤炭开采业以及造纸及纸制品业,这三个行业都属于资源或者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行业,产业收缩释放的劳动力不仅数量大而且劳动技能也相对较低。因此,在制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时,要根据不同生产要素的调整成本进行有步骤和恰当的产业组合,要特别注意劳动力的妥善安置和培训再就业问题。如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降低劳动力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的转换成本,从而降低结构性失业的风险。同时,正确处理短期贸易调整成本和长期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对于调整成本较大、可能引起国民经济剧烈震动的行业可以暂时实行适度保护政策,以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

总之,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更多强调各国优势的潜在可能性,而体现竞争优势的产业内贸易则更多强调各国优势的现实态势。因此,要想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就必须调整国家贸易战略,逐步从以产业间贸易为特征向以产业内贸易为特征的贸易模式转变^[15]。但要注意的是,在关注贸易形式转变的同时要追求低贸易调整成本,同时兼顾高技术行业的快速发展和低技术行业的转型与升级,以及处理好短期贸易调整成本和长期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只有处理好上述关系,大力发展产业内贸易才能真正成为国家贸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 [1] Balassa, B. Tariff Reductions and Trade in Manufactures among the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6, 56(3): 466—473.
- [2] Marius Brülhart, Robert J. R. Elliott. Adjustment to the European Single Market: Inferences from Intra-industry Trade Patterns [J].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1998, 25(3): 225—247.
- [3] Marius Brülhart, Anthony Murphy, Eric Strobl. Intra-industry Trade and Job Turnover [Z]. NSF Working Paper, 2004, (4): 1—34.
- [4] Robert J. R. Elliott, Joanne K. Lindley. Trade, Skills and Adjustment Costs: A Study of Intra-sectoral Labor Mobility [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6, 10(1): 20—41.
- [5] Faustino, Horacio C., Leitao, Nuno Carlos. Intra-industry Trade and Labor Costs: The Smooth Adjustment Hypothesis [Z]. ISEG Working Paper, 2009, (12): 1—14.
- [6] 李坤望, 施炳展. 产业内贸易变迁与贸易自由化调整成本——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C]. 2005 年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
- [7] 王诏怡. 中韩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实证研究 [J]. 西部论坛, 2012, (5): 71—78.
- [8] 孙孟. 经济一体化下中国贸易发展与劳动力市场调整关系研究——“平滑调整假说”及其在中国适用性研究 [J]. 财贸经济, 2011, (3): 67—88.
- [9] 佟家栋, 刘钧霆. 中国与日韩制造业贸易调整成本的经验研究——基于边际产业内贸易分析 [J]. 南开经济研究, 2006, (3): 3—12.
- [10] 孙孟, 张彬. 经济一体化下中国贸易自由化调整成本实证研究——以中国和澳大利亚自贸区建立为例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0, (8): 75—81.
- [11] 莫莎, 刘朝霞. 中美工业制成品贸易调整成本的实证研究——基于边际产业内贸易视角 [J]. 财经问题研究, 2010, (9): 96—100.
- [12] 陈立泰, 梁乐, 张祖姝. 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J]. 西部论坛, 2012, (2): 95—101.
- [13] 盛斌.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 [14] 陈志勇, 范雯. 中国国际贸易均衡与财税制度转型 [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2, (1): 55—60.
- [15] 周申, 李可爱, 鞠然. 贸易结构与就业结构: 基于中国工业部门的分析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2, (3): 63—75.

(责任编辑:肖加元)